

# 從大字報看匪區的動亂

##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六十四次學術座談會紀錄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六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召開學術座談會，討論題目為「從大字報看匪區的動亂」。座談會由該所主任杭立武博士主持，應邀出席者計有王健民、余延苗、周文青、洪幼樵、邊耀東、項迺光、裘孔淵、趙先運、荊瑞先、陳定中、陳森文、陳濟民、杜龍潭、張鎮邦、郭華倫、尹慶耀、朱文琳、汪學文等專家學者五十餘人。茲將當日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參考。

**主席致詞：**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自從共匪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大陸各地出現了「大字報」。「大字報」乃是「批林批孔」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一種權力鬥爭的工具，是結合權力與思想鬥爭的具體表現。從「大字報」可以看出很多問題，如宮廷派（江青派）與溫和派（周恩來派）鬥爭的激烈，軍人的失勢，文革派的得勢，羣衆與幹部的對立，工農業生產的遲滯等問題。目前「大字報」已趨向結束階段，請各位專家學者就「大字報」出現以來，對大陸所產生的影響發表高見。首先請所方專家學者以姓氏筆劃最多者依序發言。

趙先運先生：

「大字報」是毛派黨內鬥爭奪權的武器

「批林批孔」運動陷於進退兩難之中

、希望更進一步瞭解真象的需要，也可以從中共「批林批孔運動」中「大字報」起伏的情況，引伸探討全面的問題，實在是一個很當時令的題目。在下面的報告，便打算針對這兩點，提出一些概括的見解，請多指正、補充：

一、「大字報」是毛澤東創造的黨內爭奪領導權力鬥爭的武器：

誰都知道「大字報」氾濫街頭的情況，曾是中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特點。它當時暴露了中共內部的動亂，也大致表達了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所要打倒的對象，和路線鬥爭所要反擊的「潮流」。但是，要深刻地體認「大字報」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再次普遍出現一事的嚴重性，似乎還應該較為深入的探討「貼大字報」這個鬥爭形式，在毛澤東

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戰略部署上所佔的地位。爲着這個原故，許我們先回顧中共最爲大言不慚的許多文章中的一個例子。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即在中共公開發表它在此一年前對內祕密頒發的、「吹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軍的號角」的「五·一六通知」的當天，「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編輯部聯合發表題爲「偉大的歷史文件」的文章，這文章說「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這個偉大的歷史文件，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似乎從此以後，馬克思主義便進入了「毛澤東思想階段」。

據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發現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規律，創立了社會主義學說；列寧和史達林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解決了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系列問題，解決了在一個國家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此後，因爲毛澤東「又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了當代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問題，解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完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學說的一個極大的飛躍」，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就發展馬列主義問題指責毛澤東的自大狂，那是共產黨徒的事情；對於根本否定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具有任何科學價值的人們而言，毛澤東在馬列主義道路上的發展越大，他所犯的謬誤便越大，並沒有什麼值得誇耀之處。這且不去說它。且看這所謂的「毛澤東思想階段的馬克思主義」自命要解決的問題。

據前引文章說，「毛澤東思想階段的馬克思主義」，所要解決的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特別是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成完成以後，還有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社會上一切階級鬥爭，是不是還集中在爭奪政權的問題上？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要不要革命？革誰的命？怎樣進行革命？這一系列的理論問題」。又據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爲受到他們生存時代歷史條件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列寧死得太早，「沒來得及在實際上解決這些問題」；史達林雖然「在實際上解決了很大一批鑽進黨內的反革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但直到他「臨死的前

一年」，「才覺察到」他「在理論上不承認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缺點！只有毛澤東「正確地解決了這一系列的問題」。他對上列各問題都作肯定的回答；對於「革誰的命的問題」，則說「革命的主要對象是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具體些說，在「文革」期間便是所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當前的「批林批孔」運動中，便是「林彪一類騙子」和「林彪死黨」。至於「怎樣進行革命？」的問題，毛澤東前此在「文革」期間更已經有了充份的表演。檢查他在「文革」期間使用的武器，第一件拿出來的便是「大字報」。

如果說「大字報」此前在「文革」期間，還只是爲着發動羣衆進行奪權鬥爭的權宜之計，而一時採用的武器，現在則已經是中共內部鬥爭的制式武器了。這可從下列的幾條資料中得到證明：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其中第三條，把「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羣衆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羣衆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幹部，稱爲「無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的好學生」。這條決議肯定和鼓勵黨內鬥爭可以採用「大字報」的形式。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還以身示範，寫了題爲「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基本通過」的「憲法修改草案」，用它全文三十條中的一條，第十三條，規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羣衆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並且對於「人民羣衆運用這種形式」，「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提出「國家保證」。

反黨紀的現象進行堅決的鬥爭」。

綜上所述「大字報」從最初出現作為中共內部鬥爭的一種形式，到它載列於中共政權的憲法修改草案和出現於中共修改憲章的報告，成為制式的武器，可以看出「大字報」在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和實踐中，確實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已成為中共維持黨的紀律和進行黨內鬥爭全盤部局的一個組成部份。在個別出現的時候，它是中共運用「羣衆監督」，糾正局部偏差和鞭策個別幹部的一種手段；在普遍出現的時候，便顯然是中共內部鬥爭再起的惡兆，可以證明中共內部，又「集中在奪取政權的問題」上，或在鞏固黨對「國家的領導」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上，展開了新鬥爭。

## 二、「批林批孔」運動中，「大字報」由內而外、由下而上發展起伏的過程：

中共在去年八月召開「十大」前夕，掀起「反潮流鬥爭」；「十大」閉幕後，公開把它行已多年的「批修整風運動」正名為「批林整風運動」，同時把批判孔子和崇揚秦始皇作為「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到十二月間，更又把批判孔子提高與批判林彪併列，羅織附會，說林彪是孔子的信徒，從而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並把崇揚秦始皇這一部份推演成為揚法批儒的鬥爭，要求總結歷史上儒法鬥爭的經驗，從中引出歷史規律，藉以指導現實的鬥爭，同時加緊進行它所謂的「反修正主義潮流的鬥爭」。中共如此安排的用意，為的是把「否定文革」和翻案風潮流的思想根源歸之於孔子，政治根源歸之於林彪，一方面冀圖消滅我國以儒家精神為中心的傳統文化影響，杜絕反毛、反共的思想根源，另一方面冀圖在肅清林彪死黨的口號下，消滅黨內反對勢力，解決現實的政治難題。

「批林批孔」運動發起後，「大字報」立即出現作為揭發批判修正主義的武器。它當時所以沒有引起外人的注意，一是因為它所揭發的問題，還都是些個別基層單位和個別基層幹部的偏差和錯誤；另也因為它主要是貼在工廠和學校內部，不易為外人所窺見。但是，總結運動初期的情況，譬如本年——

元月十八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加「編者按」刊出「上港五區」幾個共青團員和「中共上港五區委員會」寫的兩張「大字報」；

二月一日「人民日報」加「編者按」發表的「上海港務局第五裝卸區工人的一張大字報」；

二月十三日「福建日報」發表的平潭縣紅心中學學生丁士豐的「大字報」；

二月廿八日「昭烏達報」加「編者按」發表的林國聲等幾個工人的「大字報」；

二月廿八日「河南日報」加「編者按」發表的幾個工人的「大字報」；

二月廿八日「雲南日報」加「編者按」發表的昆明紡織廠工人的「大字報」；

以及所有這些「大字報」都由有關各報編輯部派人調查，和提出調查意見；

仍然可以看出中共當時的作法，原是希望在有組織、有控制的情况下，進行它所謂的「反潮流鬥爭」。由於中共的「文權」和「黨權」，當前大體上是由江青為象徵的「文革」新起人物掌握着，這種部局，也就顯露出這次「大字報」的出籠，是這一夥人排除異己的初步行動。但是，這一類的「大字報」，所提出的雖然或者是大掃、特掃「教育領域的封、資、修流毒」，或者是「當前企業管理中的要害問題」，或者是「工業、企業目前存在的大是、大非問題」，都屬大題目，它所涉及的階層和人物，如前所言，却始終沒有超過個別教師和工廠、企業基層單位。到三、四月間，這種作法便告中止。

四月初，中共總結「批林批孔」運動前段經驗，跨入現實鬥爭。公開提出的口號是：結合學、批、聯，進行鬥、批、改。即結合學習馬、列、毛著作，學習毛在「文革」期間的指示，學習中共中央關於「批林批孔」運動的文件和報刊有關文章，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義，進行鬥批、改。

如所週知，「鬥、批、改」原是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間提出的政

治任務，這一口號的重申，除說明「批林批孔」運動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也顯出中共將調整部署，大力推動，進行鬥爭。恰巧在此關鍵時刻，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指導運動方面發生了分歧。周恩來總結前段經驗，說：「禁止串連，禁止武鬥」，地方找證據，中央作決定；毛澤東嫌這總結消極，有限制意味，另加「批示」說：「鼓勵貼大字報，不遏止貼大字報。經此一番周章後，「大字報」便在六月間氾濫街頭，引起了世人的普遍注意。「大字報」從工廠、學校內部走上街頭這件事，標誌着中共內部爭升高發展。批判的對象，也由基層而漸次涉及到中央階層。據不完全統計，省級以上幹部遭受大字報指名批判的已達七十多人。其中包括了黨、政、軍各方面，也包括了中共內部各派的人物。甚至也包括了毛澤東自己；他被指為黨的叛徒，曾經被俘寫過悔過書。更包括了江青和姚文元，他們被分別批判為武則天和驢頭太子。這便充分暴露了混亂。與前段由批判路線錯誤而涉及有關幹部的情況相較，這一階段着重批判個人的罪狀，甚至作人身攻擊，顯示中共內部鬥爭，已瀕臨攤牌階段。用周恩來形容「美帝」、「社帝」內部危機的一句話說，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 三、結合「批林批孔」運動的曲折過程，看「大字報」出現起伏情況反映的問題：

中共「批林批孔」運動的過程，如前所言，大體上可以本年四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所刊題為「從總結經驗中學習」的文章，分成兩大階段，在第一階段中，中共從八個方面把林彪同孔子聯繫在一起，用以「證明」林彪是孔子的信徒和從中歸納出「林彪修正主義」底要點，說它底——  
基本綱領是「克己復禮」，即復辟資本主義，

政治綱領是「國家主席」，即冀圖奪取國家權力；  
理論綱領是「天才論」，即謂林彪自命為「天才」，並憑這個資格自命只有他自己才配當「國家主席」；

組織綱領是「國家主席」，即冀圖奪取政權的基本隊伍；

策略綱領是「要兩面派」，搞陰謀詭計；「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

爲着針對這些綱領，發動廣泛的鬥爭，中共也提出一系列毛澤東思想和政治路線的綱領，說到底——

基本綱領是堅持階級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確立黨的一元化領導；

理論綱領是「人的知識只能從實踐中來」，要正確處理領袖、政黨和羣衆的關係；

組織綱領是「老、中、青三結合」，要以老帶中，以中帶青，交替培養，輪番繼承；

策略綱領，是要堅持「三要、三不要原則」，即「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修正主義」。

又把上列的鬥爭，歸納在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兩方面。爲了進行思想鬥爭，批判孔子，編織我國歷史上有一條反孔的傳統，中共便研究和總結儒法鬥爭的歷史，爲了進行政治鬥爭，肅清林彪事件的影響，它在繼續批判林彪的同時，又提出「抓林彪死黨」的號召。

以上是「批林批孔」運動第一階段在理論方面的佈局。在實際鬥爭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調動了八個一級軍區的司令員，和出現就大題目批判小人物的「大字報」。

「批林批孔」運動初期的「大字報」在選擇的題目和批判的人物兩方面顯露的不相對稱的情況，反映中共是要在有組織、有控制的情況下，逐步把鬥爭提升到中上階層，個別整肅其中的異己分子，並且還打算在路線鬥爭的幌子下，進行這種個別的整肅。而這種在組織控制下運用的「大字報」，到三、四月間，便不再出現，也說明這種作法，並未能達到預期的結果。

「批林批孔」運動跨入第二階段以後，中共假藉儒法鬥爭史，提出「國家的統一和分裂」和打擊「地方豪強勢力」的問題，反映中共在前一階段中，雖然調動了八個一級軍區司令員，但是，地方山頭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導發了新危機。到五、六月間，「大字報」走上街頭，

並且，一變前此從路線高度的大問題批判基層黨政領導機構的小人物，而為指名批判高級幹部並作人身的攻擊。另一個特點是對高級軍事頭目如大軍區司令員的批判，多在他們原任地區發動。這種情況，反映中共在鬥爭部署上已有所調整，並且即將發動現實的鬥爭。但是，所有「大字報」批判的人物，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遭受報刊的指名批判，並且，大多數都還繼續活動，其中更頗有一些人，如黑龍江的劉光濤，甚至還對遭受「大字報」批判，公然對外國大使表示他根本不介意。到近期間，「大字報」氾濫的情況，突然又轉趨低落。

上列中共在整肅鬥爭方面呈現的欲振乏力的情況，也表現在揚法批儒的鬥爭中。如所週知，在「批林批孔」運動開始的時候，中共原本對儒家採取全盤否定、對法家採取全盤肯定的態度，但是它在近期的文字中，對儒學章句突然又承認其中有的是總結勞動人民的經驗，有的是已被中共賦予了新意義，都不應該批判，並且具體提出哪些應該批判，哪些不能批判，哪些應加以區別的問題；對法家全盤肯定的態度也有所改變，它現在承認法家代表人物，因為受到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具有壓迫勞動人民的一面。

綜合上列「批林批孔」運動過程中出現的反覆曲折，中共在揚法批儒基本論調方面的變化，和「大字報」多次起伏的情況，大概有理由可以說中共的「批林批孔」運動，已經一步一步地走進了「泥潭」，當前正因為欲進乏力、欲罷不能而徘徊在一個難以決定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按中共的說法，「反修正主義潮流鬥爭」，是「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垮」。它應該怎麼辦？無論它是調整部署，掀起更為激烈的鬥爭，或是暫求一時的妥協，再作另一回合鬥爭的醞釀和部署；中共政局，在可見的將來，必然都是充滿了危險的。

### 裘孔淵先生：

## 大陸上幾乎每個省區都有動亂

從大字報看匪區的動亂

杭先生、各位先生，剛才趙先生的報告我大部份都同意，關於大字報的作用及性質，我稍做補充。大字報的形式最早是在反共運動中出現，民國十六年大鳴大放運動北平反共學生首先使用的。大鳴大放後，毛澤東在共黨內部說：大字報的形式，反共人士拿去用，右派拿去用，「我們也可以用」。毛澤東同意大字報這種形式，認為這正如一把槍，左派可以用，右派也可

以用。文革時期毛澤東帶頭提倡大字報。大字報對共匪有什麼功用？對從事研究匪情的人士有什麼作用呢？我認為：對共匪而言，大字報的功用是（一）製造歌功頌德的羣衆聲勢。就是用大字報來響應共匪黨組織的號召，貫徹其組織意旨，製造歌功頌德，使運動局面開展，這種大字報等於是放空砲，一晚上可貼五百張，一千張，沒有什麼威力。（二）對某一類幹部，某一派系起恐嚇、鞭策、監督作用。此種大字報對被指名道姓批判的人就倒霉了。（三）當權共匪幹部從大字報中收集整肅別人的資料。所以規定貼大字報要署名。（四）用大字報來讓羣衆有發洩的機會，使羣衆在大字報運動中被麻痺受欺騙，這是共匪統治大陸所運用的手段之一。至於對研究大陸問題的人士而言，大字報的功用是（一）可以看到共匪統治集團所存在的問題，及問題演變的情勢。（二）可以看出共匪統治集團的政治意向。（三）可以看出大陸人民羣衆的內心痛苦、遭遇以及願望。我們對大字報應相當重視，但也不要認為大字報浪潮的出現，就要天下大亂。我們要了解的是大字報的背景、內容及其背後隱藏的事實。大字報的另一作用是大陸上人民羣衆對毛共偽政權可以使用的特殊武器，當然它也是大陸統治者所運用的一個工具。要看這武器、工具操在誰的手裏。

當前大陸上的大字報為何氾濫成爲一個浪潮？趙先生剛才已說了很多，主要的一點是今年二月以後，共匪要把批林批孔運動放手的讓羣衆去作戰，即所謂打一個「人民戰爭」。同時共匪說批林批孔運動還要「連繫實際」，不能是空洞的理論，而要以具體的人爲鬥爭對象，這完全是共匪鼓動起來的。第二、部份幹部及羣衆誤會共匪所說的「放手去做」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翻版，可以仿效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於是大字報就自動自發的張貼了出來。我們知道，今日大陸上的共幹及羣衆爲了個人的安全與政治上的前途，明白任何事情都必須搶先，在批林批孔方面既然要貼大字報，就都一窩風搶先貼第一張大字報。貼第一張大字報妙用無窮，從前北大董元祥因爲貼了第一張大字報，就當上了偽北大革委會主任、偽北京市革委會常委、副主任。王洪文在

上海貼了第一張大字報，今天當上毛共中央副主席。羣衆搶先貼大字報，也含有此種心理。但是毛共認為運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一種誤會。今年四月間紅旗雜誌上有一篇文章初步總結「批林批孔」運動的經驗。裏面提出兩點：①不要把鬥爭方向搞亂。②過去的經驗不是都可刻板地運用的。今年三、四月間，大陸各地方已開始動亂，由於共匪封鎖甚嚴，外界難於獲悉。據大陸內部消息，四月底五月初，毛共中央總結「批林批孔」經驗，周恩來有一個十八字的總結：「不准串連，不准武鬥，地方提證據，中央作決定」，這就是說，在批判某某人如何如何時，最後要由毛共中央決定了才算。據說，毛匪對周恩來的總結加了兩句話：「允許羣衆貼大字報、不准壓制羣衆貼大字報」，所以大字報就氾濫了。據到過匪區的外國人士說，他們所經過的城市，沒有一條街道不是貼滿大字報的，有的大字報把三樓的整個窗門都封閉起來了。大字報不僅在地方氾濫，而且還貼到了北平。

現在大陸上大字報的內容如何？可以歸類為：①指責地方當權共幹對批林批孔運動不得力，消極，甚至壓制羣衆。「壓制羣衆批評」，這是一頂大帽子，這種行為文革期間是要列為「走資派」的。②指名批判某某人為林彪的死黨，或者是參加了林彪政變的陰謀。③翻文化大革命期間武鬥的老賬。

文革後期，是在軍隊壓力之下，才勉強收場的，各派彼此間的矛盾、恩怨並沒有真正解決，現在他們就利用大字報算老賬，這是派系間恩怨的表現。④還有一種是申訴個人的冤屈，如七、八十歲的老太太在街上貼大字報，指名向共幹還她的兒子。

幾乎所有的大字報都是指名的，被指名批判的都是現在地方上當權的當權派。這些當權派究竟是些什麼人呢？我們知道，文革後的地方黨、政、軍實際上是不分的，軍人首先掌權，然後出現了一個「軍、幹、羣三結合」的革委會，再由革委會核心領導小組重建了地方黨委會。所以地方當權的匪幹，有軍區的身份，又有偽革委會的身份，也有黨委的身份。因此在大字報上被點名批判的匪幹，絕大部份是有偽軍區的職務和身份的。根據另一份敵後資料，五月間，毛共中央曾發過一個指示：批判林彪死黨必須集中在軍級以上的單位，至於軍級以下是以「團結教育」為主。所謂軍級以上，就是省級軍區以上，軍級以下就是省級軍區以下，這和整頓軍隊及地方權力重新分配都有關係。但是，共匪地方當權的領導幹部，對大字報多是置之不理。他們

告訴外國人說，這是胡鬧，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此一來，大字報的威力就有限了。大字報都是由羣衆出面張貼的，他們有的是工會成員，有的是共青團成員，這就造成了一種情勢：匪領導幹部不重視羣衆，不重視大字報，不重視羣衆批評。而另一方面，這些宮廷派操縱下的羣衆組織，對地方黨委的領導總是不滿，造成了羣衆組織不聽黨委會領導的情勢。雙方各走極端，領導幹部不理會羣衆組織，羣衆組織不聽黨委會領導。關於這一點，共匪報刊上都在反覆重申幹部要「帶頭」，要接受「羣衆的批評和監督」，另一方面，羣衆組織要聽黨委會的領導。從大字報上也反映了出來，其他資料也證明是如此。

說到大字報和地方動亂的關係。動亂是事實上存在的，不是先有大字報然後才有動亂，而是先有動亂才有大字報。大字報本身就是動亂的一種。大字報透露了動亂的情形，也促進了動亂的擴大。我們過去在研究大陸地方動亂的態度上還嫌保守了一點。但是最近大量豐富的資料，證明大陸上幾乎每個省區都有動亂，程度大小不一而已。江蘇、江西、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四川、貴州、雲南、乃至新疆、東北，都充滿了大字報，也都持續着動亂。

動亂的情勢比大字報更值得我們重視。以福建而言，在今年二月以後，福州市會有幾個月是處在無政府狀態，毛共福建省委宣傳部長偕同其妻子跳樓自殺，因為他被批判說是林彪的死黨，對於出版「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同志」那本小冊子，負有責任。幹部跳樓自殺不祇發生在福建，其他地方也有類似事件，這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以江西的情況而言，江西的毛共被迫於六月三十日成立了「南昌市人民兵總指揮部」，根據敵後資料，民兵總指揮部成立大會時，台上開會，台下打架，死傷了很多人。就廣州而言，羣衆的武鬥也非常厲害，甚至毛共中央軍委下達命令，軍隊不許上街，不許介入到地方武鬥裏面去。湖南、湖北也是如此。四川也很嚴重，據說，白天匪幹的家都被搶劫一空。

動亂造成了什麼後果呢？首先，它證明了毛共在「十大」所摻補起來的團結局面，重新發生了破裂，文革期間所潛伏着的矛盾又重新爆發，很多地方革委會陷於攤換，這主要是因為「軍、幹、羣三結合」的基礎已喪失了，匪軍軍人態度消極，不敢有所作為。匪軍軍人在林彪事件後，是處於被動挨打

的地位，他們不敢對目前的局勢表示態度。文革期間他們可以「支左」，現在沒有人敢公開出面支持任何一方。其次是造成了幹部和羣衆的對立，幹部不

理會羣衆，羣衆不聽黨委幹部的領導。整個毛共集團在大陸人民面前越來越醜化，而不像他們自己所說的「正確」及「偉大」，匪幹在羣衆面前越來越喪失了他們的威信，文革時期已經有過這種情況，現在從大字報浪潮中又可發現這種情況。大家覺得「十大」以後，地方上新起的擁毛的當權派，原來也是那麼個東西，充分暴露了醜陋性。第三，動亂已影響到了生產。匪方很多資料都說明了「要打擊階級敵人破壞生產、破壞治安、妨害交通運輸」，這些情形在文革時也都出現過的。第四、影響到了偽四屆「人大」的召開，這是無庸置疑的。第五、影響到了周匪恩來的心情。周匪早不生病晚不生病，而却在大字報氾濫地方動亂擴大時生病，應該不是一種巧合。從好的方面看，周匪是毛匪的忠臣，他對此種情形可能憂心忡忡；從壞的方面看，周匪可能在政治有了惡劣的遭遇，所以藉生病來逐漸隱退。

這件事的未來發展將如何？我以為：（一）批林批孔的羣衆運動是否已在慢慢的改向或在收縮之中？這點要請各位先生多多指教。因為現在毛共叫出了「要深入、普及、持久的進行批林批孔運動」的口號，它的意思似乎是不是轟轟烈烈突擊式的搞，而要細水長流。運動變成了長期化，這就不是運動了。另外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下，各地都在強調「不要誤了生產」。

（二）羣衆的行動也正受到了壓縮，各地方紛紛出動了城市民兵維護社會治安；並強調「服從紀律」，強調「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力鬥爭的情勢下，毛匪正在積極作權力的重新分配，進行人事的重新安排，這是毛共今日所必須做的。

最後我要提出來的是，在目前情勢之下，對毛共而言，是非常困難和危險的關頭，為了擺脫這個情勢，毛共可能匆匆忙忙召開四屆偽「人大」會議，或者對外做一兩件刺激性的軍事行動，包括對蘇俄及在台灣海峽的挑釁在內。這樣做，是為了要轉移大陸人民的視線，振奮消沉徬徨的黨員士氣與鬥志，把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矛盾加以收縮，並控制正在蔓延擴大的動亂。這是值得我們提高警惕的。

張鎮邦先生：

## 共匪逐漸收縮「批林批孔」運動

### 基於軍事政治社會經濟四原因

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共匪就把「大字報」作為發動羣衆開展政治鬥爭的主要方式，現在共匪在整個大陸匪區推進的「批林批孔」運動自亦不能例外。因此，具體分析大陸各地張貼「大字報」的情況，即不難弄清共匪「批林批孔」運動整個過程的演變和發展。

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大陸各地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張貼大字報，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各個單位紛紛搞「大字報專欄」，格式齊整，裝飾漂亮，有紅有綠，內容全是公式化、理論化的批判林、孔文字。大部份單位由基層供稿，上級修改，由專人專職的批判小組或宣傳組負責製作；有些單位生產任務繁，乾脆把報紙、雜誌上的文章轉抄貼出去就算了。

第二階段：各大專學校和工廠開始貼出大字報，聯繫本單位的實際情況「批林批孔」，針對本單位存在的問題不指名批判工人、學生或基層幹部，所揭發的問題不關痛癢，單位領導見了還予以表揚，認為頗能聯繫實際，學習毛匪思想解決問題。但後來批鬥的矛頭逐漸隱約的指向領導階層。

第三階段：開始指名攻擊領導階層，矛頭直接指向各單位匪黨委負責幹部。以福建省為例，連韓先楚（原匪福州軍區司令員，現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原匪蘭州軍區司令員，現任匪福州軍區司令員）也在批鬥之列。此時開始出現由擁護匪黨委的人張貼的反擊的大字報。匪黨委為恐此種情況發展下去不可收拾，便開始鎮壓。

第四階段：對立兩派逐漸形成，彼此滿街貼出大字報對罵，有些並由對罵發展成爲派系武鬥。

大陸各地在共匪「批林批孔」運動中貼出的大字報所以經歷上述四個階段，是和匪偽中央就張貼大字報問題前後作出的決策分不開的。根據自大陸傳出來的消息，匪偽中央在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之初，曾規定大字報只能

在單位內部張貼，不能上街；而且貼大字報的人只能就事論事，不能進行指名攻擊。上文所述的第一第二階段，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但是結果羣衆無法發動起來，整個「批林批孔」運動顯得冷冷清清。這就迫使共匪不得不改變策略，將貼大字報的限制放寬，企圖通過大字報的張貼，發動羣衆揭發一些領導匪幹的錯誤和罪行，揭開鬥爭蓋子，以達到整肅林彪餘黨及其他反毛、反文革派份子的目的。於是大字報開始貼到街上來，並導致兩種現象的出現，一種現象是地方領導幹部對張貼大字報攻擊領導的羣衆實行鎮壓；另一種現象是具有不同立場和背景的羣衆通過大字報互相攻擊謾罵，甚至由此引起派系武鬥的重新爆發。這個時候匪偽中央又對下級提出下列的要求：

(一) 在運動中出現不同意見是正常的現象，羣衆會在爭論中區別正確和錯誤。黨的領導對於正確意見要善於總結，付諸實現；對於錯誤的意見要耐心解釋，引導羣衆走向正確的軌道，要防止任何壓制現象的出現。

(二) 要防止一小撮階級敵人與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羣衆中的不同意見，挑起派性鬥爭。如有出現，各級黨領導應該及時處理，充分發動羣衆，把個別的壞人揪出來。

(三) 可以通過在本單位貼大字報及送小字報的方式，幫助領導改進工作方法。

(四) 任何運動的最終目的都在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黨領導必須堅決執行「抓革命、促生產」的指示，不放鬆的抓好生產的各個環節。

從匪偽中央所指示的上述各點可以看出，當時共匪是不太主張把大字報貼在街上的。但據說毛匪在五月初對這個問題又作了「指示」，他說：「大字報貼在馬路上，我看沒有什麼不好，外國人要看，中國人更要看。羣衆有氣，就讓他們出出氣，大不了以後洗一洗」。由於有了毛匪這個「指示」，大陸各地就在五、六月間出現了大字報滿天飛的現象。

不過進入七月以後，共匪又轉而禁止大字報在街上張貼。於是大字報開始由盛而衰，而共匪的「批林批孔」運動也在這個時候出現了收縮的現象。共匪的「批林批孔」運動為什麼在七月之後轉向收縮，一時雖難確切說明，但綜合各方面的情況，仍然可以提出下列四點解釋：第一，毛匪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主要目的在清除匪軍內部的林彪餘黨，這一點可以五六月間共匪在廣東、雲南地區喊出揪鬥林彪的代理人及其同伙來加以說明。

但林彪餘黨在匪軍中為數甚夥，共匪如一一揪鬥，對整個匪軍所產生的震動實在太大，影響所及，甚至可能動搖匪軍的根本。因此共匪雖然作出了整肅林彪餘黨的決定，亦不得不臨事猶豫，適可而止。第二，共匪鼓勵羣衆張貼大字報批評領導匪幹，對於發動羣衆會起很大的作用。但這樣一來，就造成羣衆與領導的對立以及領導對羣衆的鎮壓，有些羣衆還通過大字報對江青等文革派發動攻擊，這就使得掌握匪偽中央的文革派處於支持羣衆還是支持領導的兩難地位，而不得不下達禁止大字報上街的命令。第三，大陸各地羣衆經過共匪發動攻擊，這就使得掌握匪偽中央的文革派處於支持羣衆還是支持領導的兩難地位，而不得不下達禁止大字報上街的命令。第三，大陸各地羣衆開始重演「文化大革命」期間上京請願，到處串連以及聚衆武鬥的一幕，對社會治安構成嚴重的威脅。第四，大陸羣衆一經共匪發動，即紛紛離開工作崗位，參加政治活動與政治鬥爭，這就使得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的影響。由此可見，共匪在七月旬突然改變它的推進「批林批孔」運動的策略，乃是基於上述軍事、政治、社會、經濟等四點原因，以免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轍。

共匪既然有意把「批林批孔」運動暫時收縮，現在擺在我們面前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就是：共匪準備在下一步幹什麼？

## 陳定中先生：

### 匪區「大字報」反映

#### 經濟問題極為嚴重

共匪發動「批林批孔」之初，原是希望這一運動在被控制之下，以貼「大字報」——文鬥——的方式來達成其批鬥整肅的目的。今年二月共匪作出有關「批林批孔」的八項政策指示，其中前四項就特別規定：嚴禁派系組織；人身攻擊和濫用私刑；嚴禁武鬥、串連和組織類似「紅衛兵」組織的活動；不准影響工廠的生產任務；以及不准影響春耕生產等。但情勢的發展却與共匪的主觀願望背道而馳，整個運動還是從文鬥逐漸發展成武鬥，目前匪區各省出現武鬥的動亂情況正在加深發展。尤其是共匪各經濟部門情況極為混亂，存在問題最多，共匪各廠礦企業張貼「大字報」所暴露的問題，就很值

得注意。

## 一、攻擊經濟系統的「黑線回潮」

共匪指文革期間一度被批判過的「修正主義路線」現在又偷偷地恢復，叫做「黑線回潮」。為了攻擊經濟系統的「黑線回潮」，今年一月十八日文革派在上海貼出偽「上海港務局第五裝卸區」工人的第一張大字報，攻擊該裝卸區領導幹部把工人當作奴隸。此後匪區其他城市的工人和農村人民公社社員攻擊本單位領導的大字報紛紛出籠。這些大字報雖然沒有指出被攻擊者的姓名，但攻擊的矛頭都是指向各單位的領導幹部，揭發的罪名都以文革的成果被否定及經濟領域的「黑線回潮」作為重點。在最初兩三個月內，共匪為消除工農羣衆害怕貼大字報會遭到打擊報復的顧慮，還特別選出一部份大字報在報紙電台發表，下面列舉的就是共匪公開披露的部份大字報的主要內容：

偽「上海港務局第五裝卸區」工人的大字報，攻擊領導幹部脫離羣衆，壓迫羣衆。主要罪狀包括：「領導嘴上說依靠羣衆，做起來就忘了羣衆」，「領導不是把工人當做碼頭的主人，而是視爲順位的奴隸」，「不是靠政治思想工作去發動羣衆，而是靠刺激，靠壓力」，「只抓進度，不抓路線」。

偽「上海鋼鐵五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幹部的兩大罪狀，一是「卡」住工人請病假，規定工人請病假要經過醫生、工長、值班主任等連串人的批准；二是用「扣鋼制度」處罰工人，用處罰代替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河北省偽「宣化鋼鐵公司機修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犯了三大罪狀：（一）幹部不參加勞動，坐在辦公室裏靠電話指揮，要情況，偶而下去則是蜻蜓點水，走馬看花。（二）恢復文革前的舊架子，大量向下面調人，造成機構龐大，人浮於事。（三）「生產第一」再度抬頭，「一味追求噸數，抓數量」。

偽「北京鐵路管理局豐台段」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段領導罪狀：一是不抓路線，只抓修車，二是不參加勞動，三是不支持工人的技術革新。

偽「吉林染料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幹部三大錯誤是：只相信洋

老爺不相信羣衆，只相信物質條件不相信工人的思想覺悟，不靠政治掛帥，而是認爲「獎金沒有了，工人的積極性也沒有了」。

偽「南京鳳凰山鐵礦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不相信羣衆，靠少數人冷冷清清辦企業。

浙江省偽「紹興縣農機修造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片面追求利潤」，走向修正主義辦企業的路線。  
廣西省偽「河池縣農機修造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重犯「金錢掛帥」的修正主義路線，「重造輕修」，不願爲農業服務，實行「大利大幹，小利小幹，無利不幹」。

廣東省偽「三水縣磷肥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實行「死任務、活時間，完成任務早收工」的「包工」辦法，產品質量受到嚴重影響，造成大伙「去搞個人收入」。

偽「福州雨傘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專搞「物質刺激」，在年終時每人獎給一只鋁鍋，而且專靠壓力「管、卡、壓工人」。

河南省偽「洛陽軸承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執行「超額獎勵制度」，按單位定額計算，在八小時工作時間內，每天增加一個工時的產量就獎給匪幣一角，完成六十五個工作時的，可在月工資上增加匪幣三元。

偽「天津地毯二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在春節前實行超額完成指標百分之三，就可提前回家的「包產」辦法，是劉少奇「包產到戶」黑貨的恢復。

河北省偽「張家口煉炭機械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搞專家治廠」，「對工人的技術革新懷疑態度」。

偽「石油化工公司設計研究所」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所領導排擠工人，「把大字號（大學生）的基本留下，中字號（中學生）的部份留下，工字號（工人）的全部調走」。

新疆省偽「迪化有色金屬冶煉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看不起工人，千方百計取消掉「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的三結合」。

江蘇省偽「常州拖拉機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有思想包袱，不依靠工人，不敢大膽領導運動，對修正主義路線回潮不加批判。

陝西省偽「延安無線電總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穿新鞋走

老路，就生產論生產」，放鬆對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的批判。

僞「北京半導體器件廠」工人的大字報，指責該廠領導今年第一季度以降低原訂生產計劃百分之二十的做法，來作爲提前三天完成季度計劃的欺騙手段。

廣西省僞「南丹縣農機修造廠」女工的大字報，指責該廠把工人從車間抽到辦公室，全廠只有一百三十七人，廠部却設了四股一室，非生產人員佔百分之二十八點四。

吉林省柳河縣匪「五道溝公社第五生產隊」社員的大字報，指責該大隊出現修正主義路線回潮的事實包括：「學大寨」不學路線及農業生產「以錢爲綱」等。

江蘇省溧陽縣匪「上黃公社」社員的大字報，指責該公社漁業生產大隊實行「包產到船，包產到戶」，把原來集體生產的六條漁船，改爲「一家一戶單幹生產」。

廣東省順德縣匪龍江公社副書記寫給「南方日報」的信，指出「機關許多現象嚴重，領導機構不是爲基層服務，而是要基層爲機關服務」。指責許多社隊幹部參加勞動的天數都沒有達到最低的規定。「幹部的報酬及津貼普遍偏多、偏高」。

## 二、「大字報」暴露的許多老問題

從以上「大字報」攻擊的對象和內容歸納，我們可以看出今天在共匪經濟領域再度出現的老問題，也就是所謂「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批判過的東西，現在又出現回潮的問題，至少有下列八項：

第一是所謂領導不相信羣衆，用規章制度「管、卡、壓工人」的問題。

第二是恢復「專家治廠」，破壞「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問題。

第四是幹部不依靠「政治掛帥」，而單純依靠「獎金掛帥」和「物質刺激」來調動工人生產積極性的問題。

第五是領導不接受羣衆意見，壓制新生事物，對工人的技術革新不支持，而迷信「洋奴哲學」的問題。

第六是不貫徹「精簡下放」，借「調整充實」恢復原有機構，造成「人浮於事，幹部脫離羣衆」的問題。

第七是幹部不參加生產勞動的問題。

第八是農業「不學大寨」和「以錢爲綱」的「修正主義路線」回潮問題。

。

文革暴亂以後，共匪打着反「資本主義路線」和反「修正主義路線」的口號，在工礦企業批判所謂「企業自治」「專家治廠」「生產第一」「利潤掛帥」「物質刺激」「洋奴哲學」「爬行主義」「鈔票掛帥」及「管、卡、壓工人」等「修正主義辦企業的路線」。在農村則批判所謂「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包產到戶」「以錢爲綱」「重副輕農」「工分掛帥」及「物質刺激」等農村「資、修主義路線」。並號召工農大眾把所有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統統加以砸爛，「破舊立新」。而在許多偏激冒險措施中，反「修正主義路線」「破舊立新」「精簡下放」及「三結合」等，則是毛匪澤東的「路線」的主要標誌。例如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共匪各廠礦企業的規章制度及農村公社原有的經營管理制度均被砸爛。各機關原有的領導組織均被瓦解，奪權後重建的廠礦「領導班子」，都由「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三結合」組成的。在「精簡下放」方面，僞國務院就率先響應，將所屬的九十個機構「精簡」爲二十六個，將原有的六萬多名幹部裁減到祇剩下一萬人。其他工廠企業也多數從原來的三級體制改爲兩級，大批科室加以合併，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幹部均被下放到基層參加生產勞動。工業管理人員由佔職工總人數百分之二十，減爲佔職工總數百分之三、四。爲安置被裁撤幹部的所謂「五七幹校」也應運而生。但曾幾何時，這些代表毛匪「路線」的標誌和文革的「偉大成果」，大部份已煙消雲散，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管、卡、壓工」的規章，仍然是「物質刺激」的一套修正主義辦法，仍然是「洋奴哲學」的崇洋思想，仍然是「機構臃腫重疊」，幹部浮在上面的故態。這一切都與文革期間的做法大相逕庭。這反映出當前共匪經濟領域的潛在問題確是嚴重的，欲克服這些問題也是十分困難的。

為什麼會造成共匪在經濟措施上一再出現自相否定的反復，這和毛匪澤東冒險經濟路線走不通是有密切關係的。譬如：

在經營管理制度方面，人們還記得，當文革初期，共匪過份誇大工人的主觀能動性，強調文革後工人思想覺悟已大大提高，不必依靠勞動管理的框框。迨廢止企業的規章制度而造成混亂之後，一九七〇年共匪終於不得不改變說法，強調「必要」的規章制度還是要繼續維持。並着手在工礦部門重建各種規章制度。現在又指責這些規章制度是恢復「管、卡、壓工人」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回潮。

在工資及獎勵制度方面，文革暴亂之初，由於奪權期間共匪一度對各單位失去控制，匪區發生了相當嚴重的「經濟主義」風潮。一九六七年一月匪黨中央特為發出「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叫囂「立即停止這種大鬧經濟主義的傾向」「保護集體財產」。一九六八年一月匪黨中央又發出「關於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的通知」，重申「不准分掉集體所有制單位的流動資金、公益金、公積金」。繼而於一九六九年在農村全面開展「經濟領域的階級鬥爭」。一九七〇年初又轉為「一打三反」運動（打擊反革命份子和反投機倒把等）。由於經過兩三年的鎮壓打擊，工資被凍結，津貼被取消，獎勵制度被廢止，所以才出現了「五七二工程紀要」所說的「國民經濟停滯不前，農民缺食少穿，人民生活水準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等現象。迫使共匪在一九七一年開始進行工資調整，把被取消的獎金津貼恢復了一小部份，統一名稱為「附加工資」，同時逐步恢復了一些獎勵辦法。現在共匪又把罪責推卸到企業領導幹部身上，其必然激起職工的更大不滿，甚至明顯。

在農村經濟政策方面：文革以後共匪沒收了農民的「自留地」，禁止農民經營家庭副業和取消一切獎勵辦法。不但損害到農民的私人利益，也打擊到社、隊的生產積極性，結果造成農村經濟長期陷入窒息。一九七〇年以後，共匪終於不得不重撥自留地給農民，允許他們經營家庭副業，開放農村集市，恢復「評工記分」及農產品獎售辦法。並一再聲明這是匪黨要長期實施的政策。在這樣反復搖擺自相否定的情形下，大陸農村才流行着「劉少奇的工分掛帥臭是臭，還是頂用，大忙時間用一段，用過以後再批判」的笑話。這都是毛匪經濟路線走不通的有力例證。

最後還有一點必須指出，共匪在文革期間經常用「羣衆鬥羣衆」的方法來達成牠打一派拉一派的目的。所以共匪的幹部既討厭羣衆，又害怕羣衆，為了保護自己鬥敵人，他們必須有自己的「羣衆」，因此，在利害問題上，他們不得不討好「羣衆」，遷就「羣衆」，特別是在物質利益方面，更非遷就不可。這就是共匪經濟措施一再出現自相否定的反復而始終消滅不了「經濟主義」風潮的原因。

### 三、上半年工農業生產深受影響

如前所述，共匪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原是打着不准搞派系、不准武鬥及不影響生產的如意算盤。但隨着情勢的發展，現在却派系林立，壁壘分明，武鬥不斷出現。像最近兩三個月，四川、青海、西藏、甘肅、陝西、河南、山東、湖北、江蘇、安徽、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均出現相當激烈的武鬥，死傷人數頗多，工農業生產因而大受影響。

在工業生產方面：共匪發動「批林批孔」之初，在廠礦企業抽調三分之一的職工去搞運動，而要求其餘三分之二的職工負責完成生產任務，同時還佔用職工的休息時間搞運動。所以「批林批孔」一開始就引起職工極端不滿。迨共匪各廠礦企業的「大字報」普遍出現之後，許多工人抓住機會大肆抨擊幹部。例如攻擊匪幹鑑定工作態度不公，恢復獎金制度違背政治掛帥原則。並揚言工人不是「工具」，不是「奴隸」，不應該從事永無休止的勞動。反對廠礦企業再用規章制度「管、卡、壓工人」，假借搞「批林批孔」而經常缺勤或遲到早退。有的則結幫結派，藉機鬧事，挑動武鬥。像共匪武漢鋼鐵公司，河北石家莊國棉二廠，江西萍鄉安源煤礦，廣州市廣東石灰廠，廣西梧州船廠，山東濟南鐵路機廠，汽車廠，造紙廠等，均因武鬥使生產陷入半停頓狀態。武鬥期間，雙方甚至株連到家屬身上，有的地方連匪軍的眷屬和女學生也被暴亂的羣衆強暴。在這樣混亂的狀態中，大部份工人均樂得拿工資不幹活，只有少數膽子較小或家庭成份有問題的工人，因怕運動過後會被扣上「無政府主義」的罪名，才勉強到工廠虛應上班。此外，在生產普遍停頓之際，各地還出現一種「搞工業自留地」的現象。就是工人「走後門」帶原料、工具出廠加工成品出售。所以，今年第一季度以來，匪區各地工廠普遍發生無法按期交貨和完不成計劃的現象。前述「大字報」指責偽「北

京半導體器件廠」企圖用降低原訂計劃作為欺騙完成季度計劃的手段，就是最好的例證。在基本建設方面，到今年八月中旬為止，也未見共匪有若何單位建成的消息。最近外國記者發自北平的報導，證實今年上半年共匪的鋼鐵、化肥等主要工業產品的增長率均比去年同期降低。據英國「每日電訊報」

駐北平記者霍林伍茲說，今年一至六月，上海市的工業成長率只有百分之六，去年同期的增長率為百分之九。山西省今年上半年的工業成長率只有百分之五，而去年同期則為百分之十二。七月二十六日，香港「南華早報」對共匪經濟受「批林批孔」的影響也有同樣的報導，並說共匪現已轉而加強抓生產而減少抓革命。足證工業受影響的情形是頗為嚴重的。

在農業生產方面：共匪雖然提出「以批林批孔搞好春耕」的口號，要求

「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但同一期間共匪的大字報却一再攻擊「生產第一」的錯誤，在宣傳上也強調「要堅決反對藉口春耕大忙，不抓批林批孔，而只抓生產的錯誤傾向」。所以春耕期間，農村幹部大多不敢正面領導生產工作，任由農民外流，致春耕生產普遍延誤。加上工業本身受到削弱，肥料缺乏的情形比往年嚴重，自然災害也比往年更加厲害。從去秋以來，乾旱、霜凍、洪澇、病蟲、地震等災害接續發生。像北方地區乾旱持續了八個多月，石家莊地區從去秋到今年刈麥，只降雨三十毫米，只相當於小麥需水量百分之五左右。長江流域和華南地區的乾旱也持續了七個多月，今年上半年廣西的降雨量比往年同期減少了三分之二。在乾旱的同時，今年西北、西南和華南地區又遭到多次寒流的侵襲。廣東省先後出現四次霜凍災害，二、三月間廣西氣溫曾下降到攝氏零下一度，雲南瀾滄地區氣溫曾降到攝氏零下三度，大批夏收作物均被凍死。迨七月中旬以後，甘肅、青海、四川、湖北、安徽、江蘇等省又連降暴雨，洪澇成災。四川省的災情尤為嚴重。寶成、蘭青兩鐵路及主要公路均場方中斷十幾天。所以外界對共匪宣傳今年夏糧豐收，均表示懷疑。據美國農業部披露，共匪已向美國訂購了一九七四—七五年度的棉花三十七萬六千包，於葉一百二十萬磅，大豆一億二千一百萬美元。紐約商務日報也證實共匪已向國外訂購穀物一千萬噸，比去年度多出了兩百五十一萬噸。這也間接證明共匪農業歉收的情形是頗嚴重的。

## 項迺光先生：

### 「批林批孔」搞不下去只有收縮

而內部的權力鬥爭將日益激烈

我想對大字報的問題提幾點意見。第一、毛共利用羣衆貼大字報，開鬥爭會，是自文革以來所創造的利用羣衆作為政治鬥爭的一種手段。這種大字報本身顯然不是給羣衆真正民主的權利，說羣衆真想說的話，它是政治鬥爭、權力鬥爭的一種運用。

因此從大字報本身可作為觀察大陸上權力鬥爭的一種反應，一種資料，大字報不表示一種孤立的直接的表達方式。中共要整肅一個人，可以利用它作為大字報的題目。至於大字報的開放與限制，大字報的箭頭目標，都可作為我們觀察大陸內部權力鬥爭的參考。根據資料統計，大字報指明的目標，大字報所揭發的都是軍人，鬥爭的對象都是省級的領導幹部，軍隊的負責人，軍區的政委、司令員等。這些資料都很真實，都是具有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在大陸所親自看到和抄下來的，是可靠的報告，可作為研究大陸上權力鬥爭的一種參考。

大字報從今年五、六月份起不限制的到處貼，到了七月初，北京市委限制大字報上街，這裏我們可以和中共對其軍隊內部整軍的動向做一種深入的對照的研究，亦即何時是揪林彪死黨喊得最兇的時候，如韓先楚、丁盛、劉興元都可能發生了問題，而楊成武、余立金這批人又在什麼情況下解放了。從現有的資料看，這批人雖未擔任職務，但他們擔任職務只是時間的問題。從這裏可以發現毛澤東整軍受到阻撓，他們整軍的措施遭遇很大的阻力。我個人有如下的判斷：在毛有生之年，絕對無法徹底解決軍事問題。

今日中共軍隊問題的嚴重性在那裏呢？就是它無法用新的領導去接替舊的領導，今天在軍中的當權派仍然是紅軍時代、抗戰時代即八路軍時代的主要幹部，新陳代謝的渠道在軍中是阻塞不通的，因而中共軍中老幹部的力量特殊的強大。它雖有因傷殘或轉業而離開軍中的情形，但沒有任期制度，譬如蕭勁光，自海軍成立軍種起，做司令員到現在已經二十五年，他的副司令

員就接不上去。又如許世友這些大軍區司令員，這一次如果不調動的話，他們還在南京、蘭州、武漢等地做下去，每人都非常長時期的各霸一方。這種情況之下，使得下級的年青的幹部上不來，即以韓戰期間參軍的年青幹部為例，最多只做到營級幹部，做到團級幹部都是很優秀，到師級幹部是很困難的，這是指當時當兵的，而不是指當時的幹部。

這種情況，影響到毛共的整軍，因為軍隊是一種專業的機構。王洪文，可以一下子做黨中央的副主席，隨便一個人可提拔到中央黨部做部長，但不能到各軍種擔任司令員、總參謀長，毛澤東不可能隨便命令某人一下子做大將，總要有一個過程，因此，軍中的問題無法解決。軍中的老幹部，都是血肉相連，一起打爛仗、吃大鍋飯，穿著破衣草鞋一起流血流汗打出來的，帶著濃厚的宗派性與封建性，儘管人人嘴裏不說，而聲氣則相通的，黨、政、軍中的老幹部都互相聯繫的。這一個強大的勢力，對毛澤東是敷衍虛與委蛇與陽奉陰違的，因毛領導他們自遵義會議接任軍委主席以來已數十年，所以軍中的老幹部，不管他們是否心服毛澤東，他們對毛仍然有所顧慮。

毛澤東今天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培養文革派以江青王洪文為中心的一個新力量，它們在毛死後能夠繼續毛澤東路線並主觀願望能得到軍隊的擁護，這是毛整軍的原因，但這却是毛無法辦到的。

今天大陸上年青一代的幹部，沒有紅軍時代的感情的包袱，他們對於彭德懷、林彪等人並無特殊的感情，他們也許對王洪文較有好感，因彼此都是年青人，可惜這批人在軍中却沒有力量，因此毛澤東整軍時只能換來換去，打倒一派後又起用另一派人。

最近楊成武余立金等人解放的原因很簡單，就是說林彪事件時，誰是林彪的部下，誰就被打擊，而文革派文化大革命時代被打下去的幹部，這一次因沒有參加林彪的反毛政變所以重新起用，過去的不再追究。至於傅崇碧沒有出來，我看是因為傅在權力鬥爭中當面罵江青：「你算老幾。」江青認為傅崇碧可惡，讓他多關幾天，所以傅還沒露面。事實上，傅崇碧罵江青「你算老幾」這句話，正是代表解放軍的情緒。所以軍事問題是很嚴重的，這可從大字報的內容與整軍的過程中看出來，在毛整軍以便替文革派抓軍權的構想落了空。

原來文革派經過李德生抓軍權，現在李德生似乎有了問題。李離開總政

治部後誰來接替？李到瀋陽軍區後怎麼的狀況？八大軍區調動後我認為都不妙，其中有很多問題。雖然瀋陽軍區很重要，但李德生是唯一和文革派拉手的軍事將領，這時候離開中樞不是好事的，因為今天的權力鬥爭仍然在中央激烈的進行，中央的權力鬥爭未明朗化就離開，顯然不是好現象。所以軍事問題是匪區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也是毛有生之年無法解決的大問題。

第二、在一個絕對獨裁的「國家」中，利用羣衆，付予羣衆相當民主的權力，然後利用黨的權力去控制羣衆的社會權力，這是很危險的。多年以來，我一直不太重視文革派的力量，從資料看，文革派似乎掌握了青年團、婦女會、總工會、文教、體育的領導權、中央黨權等。但我不太重視文革派，因為文革派是一種假的羣衆的力量。如果它真正代表羣衆利益，那它很不起，可以推翻特權階級，造成一種新的局面。可惜文革派並不代表羣衆利益，它要羣衆為集體而犧牲個人，要羣衆政治掛帥，不要想經濟，要羣衆將孩子送到農村下放種田，這些都是違反羣衆利益的，是羣衆不願意的。因此在羣衆的運用上產生了兩種情況：

一種是少數的積極分子，以貼大字報做職業，他們在黨的指揮棒下罵人，這些人是跟隨政策轉移。

一種是廣大的羣衆中，反應了反領導的情況，他們要結合起來平反，他們要伸冤，他們要反領導，甚至變天思想都溶會一起，使他們的情緒得到某些程度的發洩。所以到了某一程度，它利用羣衆就會發生了問題，就會產生武鬥。最後不得不用軍隊來鎮壓羣衆。今天，毛共違背羣衆利益來利用羣衆，其效果有多大呢？所以在運用時不得不忽而開放，忽而限制。

第二、我認為我們應該仔細研究文革派與羣衆的關係，表面的與實際的關係，研究羣衆與中共統治者的關係，究竟中國大陸人民需要的是什麼？他們需要批林批孔運動嗎？他們需要毛澤東思想嗎？在八億人口中迷信毛澤東思想的人究竟占多少？他們經得起怎樣的考驗呢？因此我認為文革派利用羣衆，在長遠的反共革命運動的目標上看，可以發生縱火的作用，羣衆慢慢將領導打碎了，領導者的威信降低了，羣衆隨時可以貼大字報，可以利用領導者的矛盾，我們從大字報可以看出，有的大字報上說「堅決貫徹江青同志和王洪文副主席×號×號的指示」，這表示江青王洪文代表一個意見，代表偏左的意見，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及後來的中央辦公室的指示之間有了顯著的矛

盾。所以第二個要研究中共對羣衆運用、控制所發生的複雜的影響，我認為這也可能成為中共的致命傷。

我一向對城市民兵不太重視，城市民兵壓迫老百姓，它作為政治鬥爭的附庸有其作用，有其價值。如果單獨的，解放軍可以繳它的械，人民可以砸爛它，單獨有何價值呢？

第三，在這種情況之下，「批林批孔」運動搞不下去，只有收縮，偏偏毛澤東又不肯公開承認此一收縮，一定要堅持做下去。所以「批林批孔」運動是要繼續下去，是要變的，整肅的速度要緩慢，可見毛澤東的權力也有窮的一天，無法解決矛盾，只有求矛盾的暫時妥協，而內部的鬥爭將日益激烈。

### 荆瑞先生：

## 匪區的民兵和「大字報」 與大陸動亂有密切關係

首先我報告大字報與今日匪區的動亂。剛才裘先生、趙先生講得很好，我非常同意他們的看法。大陸的動亂與大字報有關係，但是沒有大字報，大陸仍然會有動亂，大字報只是對動亂的表象而已，動亂最重要的癥結，我個人的看法是民兵。這次毛、江批林批孔的「工具」和「文化大革命」截然不同，「文化大革命」是憑藉軍隊，這次是利用民兵。有一消息說：王洪文負責統一指揮大陸民兵。就我個人看法，王洪文是以工人起家，現為匪黨副主席，是否由王洪文領導各地黨委，直接控制民兵（尤其對城市產業民兵的控制），如果從這一角度來看，本項消息值得重視。

關於大字報的來源，從各方報導來看，是以城市工廠為多，這與產業民兵是有重要關聯的。

1. 有些大字報是向匪黨喊冤訴苦，甚至直接攻擊毛、江，那麼誰貼這種大字報最方便呢？這種大字報多半是在晚上貼的，根據採訪大陸的人士報導，大陸各地晚間的站崗放哨半由民兵擔任，故對毛、江敵視仇視的民兵，貼這種大字報最方便。

2. 那個地方大字報最多呢？剛才各位都講過，城市裏面的大字報居多，在城市中又以工廠裏大字報最多，各位都知道城市的「產業工人人民兵」，是民兵的主力，既然在城市裏出現了許多反毛反共的大字報，這證明，城市的「產業工人人民兵」，其可靠性大有問題。

3. 當然，有許多反毛反共的大字報，是由民眾張貼的，然而，他們不是獲致民兵的同情與掩護，怎麼會貼得成？

4. 據已知的資料，有許多地區發生了武鬥，搞武鬥必須具有武鬥的條件，只要有槍桿子，民兵自然是武鬥的主力。根據上述四點，我們可以獲致結論，民兵和大字報與大陸的動亂，有其密切的關係。

最後談一談共匪整軍的問題。我們知道「三面紅旗」破產後，共匪是運用老幹部來穩定軍隊的。

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一兩年之間，據共匪所透露的資料顯示：先後有十二萬名幹部深入到連隊去，穩定軍心搞「調查研究」，這十二萬名幹部中有很可能是已經退伍轉業的「老紅軍」、「老八路」，共匪叫他們「回娘家」來，共同挽救部隊的危機，今天中共把老幹部統統趕走了，另據匪供認新幹部多是「嫩扁担挑不起重擔子」，這對匪軍的影響太大了。林彪曾經說過：老幹部是「戰鬥的骨幹」，老幹部是「解放軍之寶」，今天這些「骨幹」、「寶」都不要了，試想，今後匪軍部隊會變成什麼樣子？！這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其次再談匪軍的軍紀問題。據共匪所要求：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執行的重點，是「一切行動聽指揮」，這也足以反證共匪軍官兵不願聽從指揮，不願服從上級。須知，造成軍紀廢弛的原因，是由來已久，「彭黃事件」後，共匪強調「官管兵、兵管官」；「文革」期間續有大批幹部遭受整肅，「林彪事件」後又有更多的幹部遭受到整肅，致使下級看不起上級，士兵看不起幹部，這對軍隊的「三信心」影響很大。試想，軍隊沒有嚴格的紀律，官兵上下喪失了「三信心」，這個部隊怎麼會打

## 「批林批孔」目的在整肅一批活人

杭主任、各位先生：

剛才大家都講得很多，我想很多話都給各位先生講完了。個人感覺到這一次座談會所提出的討論提綱很好，正是我們當前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記得上一次的座談會是專門討論「批林批孔」的問題。這一次討論「大字報」的問題，可說是上一次座談會的延續和發展。

首先我想提出的，是有關這一次匪區所出現大字報的背景的問題。我們知道，「大字報」的由來已久，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它已成為共匪發動羣衆，開展羣衆運動的一項主要武器，而張貼大字報已經成為中共發揚所謂民主的一種具體的形式。同時也成為在羣衆運動中各種對立派系用以互相攻擊的工具。

今年元旦，中共兩報一刊的社論就指出今年必須繼續深入的搞好批林整風。並且要結合批林整風，展開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亦即以批林批孔運動做為一切運動的中心。毛共明白指出，這是由於國內外的階級敵人極力的詆譖文化大革命，在大陸上出現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革成果和力量的一種右傾的思想，就是林彪路線極右的特質，而這種右傾思潮的產生，乃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影響，所以必須大力發揚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的精神，來打擊這種右傾的思潮。於是牽強附會，強調林彪一伙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搞資本主義復辟，篡改匪黨的理論基礎，或是招降納叛，結黨營私，乃至在策略上搞兩面派的手法，都是從孔子那裏「檢來的破爛」。因此，只有深入批孔才能夠更加認清林彪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才能够徹底揭露和批判林彪這一個反黨集團的罪行，肅清林彪修正主義的流毒，也才能鞏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這就很明顯，批孔是批林的一種手段，批孔的目的是爲了批林。批林也好，批孔也好，批這兩個死人，其最終目的是爲了要整肅一批活人，也就是

要整肅林彪這一系的餘黨。然而林彪一系的幹部，除了黃、吳、李、邱和葉羣這些主要的幹將已經被整肅外，還有那些參與政變的餘黨呢？毛江集團，爲了要弄清這個問題，必須想辦法，究竟用那些辦法才能把這些餘黨逼出來呢？江青他們還是採取文革初期的手段，交給羣衆去摸底，去大鳴大放，去揭露他們的具體「罪證」，大字報乃到處出現，以至演成一片混亂而複雜的現象，這是大字報出現的背景。

第二是關於大字報的主要內容問題。剛才各位先生已經談了很多，開始時毛共規定大字報只能張貼在各單位、各廠礦企業的內部，不能上街，貼大字報的人只能就事論事，不能指名攻擊。但其結果是羣衆發動不起來，整個批林批孔運動顯得冷冷清清，毛共於是改變策略，放寬貼大字報的限制，企圖通過放寬限制來鼓勵羣衆揭發一些領導幹部的錯誤和罪行，企圖掀起大字報新高潮，以求達到清除林彪餘黨和反毛反文革派的分子的目的。

如此一來，導致兩種情況的產生：一種是地方幹部對張貼大字報攻擊領導的這些羣衆實行鎮壓，另一種是導引各地方原來造反派系的死灰復燃，具有不同立場、不同背景的羣衆利用大字報互相攻擊，並由此引起各地方武鬥的重新爆發。最近，我們從匪黨中央先後對福建省委的關於大字報的四項指示，以及大字報在福建地區所經歷的四個階段就是上面這種情況的具體說明。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各地方所出現的大字報其內容很複雜。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似乎可以發現這次大字報的浪潮中都有一條主流，即大字報所揭露、攻擊的主要都是省級以上的幹部，而且主要是軍事幹部，其中絕大部分是林系的餘黨。這從廣州的發動抓林彪死黨，瀋陽市的四百多萬人的批林大集會，福建的追究發行「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林彪同志」的小冊子的責任……等情況可以看出來，也是明顯的例證。

從大字報的內容可以發現很多的被攻擊的軍事將領都很久沒有露面，這些人雖不一定都已遭整肅，但至少都在檢討之中。主要的人物如原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原空軍政委的王輝球，原鐵道兵政委宋維拭，山西省軍區司令員謝振華，山西省軍區政委曹中南，吉林省軍區第一政委王淮湘，現蘭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現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劉興元，濟南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廣州軍區第三政委任思忠，以及各大軍區許多副司令員副政委等，這些人都是在大字報很混亂的浪潮中成爲主要攻擊的對象。

這次發動大字報是由江青、王洪文所領導的，他們發動這次大字報的目的原在清除林彪的餘黨及反文革派的分子，雖然他們也有一定收穫，但其所導致的各地黨委會與黨員的矛盾，黨與羣衆之間的矛盾，羣衆組織與羣衆的矛盾，已使江青他們發現其所能掌握的，在黨的組織方面只是少數的幹部，在羣衆組織中所能掌握的只是少數核心分子，無法掌握大多數的黨員和廣大的羣衆團體的會員羣衆。且因此導致各地羣衆派系如雲南的「砲派」與「八二三派」；廣州「東風派」與「旗派」等等的復活和對立的鬥爭，影響了農業生產的萎縮，激起了地方的公然抗拒（如西藏）和消極的抵制（如各地普遍把矛盾上交）。問題層出，矛盾重重，阻力之大已迫使毛江他們不得不讓步、妥協，毛共最近普遍揚言：「批林批孔正朝着深入、普及、持久的方向發展」，已在階梯下台，而最近「大字報」浪潮的退潮，顯有暫時收縮之趨勢。當然，收縮不等於結束，其下一步將要搞些什麼，是我們必須注視的研究的課題。

### 周文青先生

## 大字報絕不是來自真正的羣衆 它是匪黨政治鬥爭運用的武器

我們要研究當前大字報的問題，必須先了解大字報產生的背景，今天在大陸上正展開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大字報就是在這一運動中出現的。我們對批林批孔應該有這樣的認識：就是批林批孔運動雖然在姿態上是一種進攻的、積極的、主動的，好像是毛澤東主動的利用這一運動，而實質上，批林批孔運動是一種防禦的、辯護的、不得已的被動的行動。如果我們認為毛澤東今天是萬能的，他要搞什麼運動就搞什麼運動，要整倒誰就整倒誰，要打倒什麼就打倒什麼，我認為這樣的看法是不對的，事實上，毛澤東今天在大陸上發動這一運動，是被動的，不得已的。

為什麼說，這是被動的不得已的呢？從批林批孔的內容中可以看出。所謂批林批孔，其內容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為第一次的文革辯護，說文革是適時的、必要的、正確的，所以不能反對，亦即維護文革期間所產生的新生物。

事物，這說明了文革中的新生事物本身根本站不住。第二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復辟。它的意思是：要羣衆為革命而生產，不要為生活而生產，凡是認為增產是為了改善生活的思想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思想，是修正主義思想，都應堅決的反對。這兩項就是整個批林批孔運動的主要內容。從這兩項內容看，可見批林批孔，不僅不受人民的歡迎，而且也不受一般匪幹的歡迎。第一、它在批林批孔中提出反潮流的主張，認為現在的當權者走着修正主義的路線，執行資本主義的路線，這就有奪權的性質，這是反現在當權的匪幹的。第二、它堅持維護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反青年的。第三、它要羣衆為革命而生產，不要為生活而生產，是反人民的。一種運動，而有着這反匪幹、反青年、反人民的三種性質，可見它是出於不得已，也可見它本身的矛盾性。

由於這一運動有著內在的矛盾，它一方面要發動羣衆起來反對修正主義，另一方面又堅持黨的領導；一方面要反潮流，一方面又要守紀律。我們知道今天匪黨大部份地區的黨權仍然握在軍人及官僚派的手中，文革派並沒有真正掌握黨的領導權。文革派主持批林批孔運動，由於它反青年、反人民的性質，它並不敢真正放手發動羣衆。由於它反當權的匪幹，匪幹們也必以種種方法相對抗。在大字報問題上於是就產生種種矛盾的現象，時而發動，時而限制，時而准它上街，時而又嚴加取締。現在匪所公佈的大字報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如果真正反映民意的大字報被貼出來，那時文革派也好，官僚派也好，都會加以鎮壓。因此，我對大字報有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現在匪所發表或加編者按的大字報絕不是來自真正的羣衆，它只是匪黨政治鬥爭運用的一種武器，它代表的是一種假民主，假辯論。

第二、大字報只是一張紙而已，本身沒什麼力量，它的力量在於大字報如真正來自於羣衆，它的意見能引起羣衆的共鳴，由共鳴而引起羣衆共同的行動，到這時它才能發揮出一種力量，成為羣衆革命的武器。但現在匪的大字報卻不是，它只能引起羣衆內心的厭惡與卑視。以此，對現在匪所渲染的大字報並不值得重視，僅有的點價值是我們可以從大字報中發現許多資料，窺見共匪內部腐爛的情形而已。我們所期待的是真正來自於羣衆的大字報。

第三、現在大陸的羣衆早已認清共匪種種欺騙的伎倆，他們也能運用大

字報表達他們的心聲，掀起一個革命的行動。可是目前共匪批林批孔的主要目標還是壓制人民。儘管文革派與官僚派正在做權力鬥爭，但壓制羣衆則是一致的。軍人亦是一樣。我懷疑它批林，只是把林彪作爲一種思想上的標的，而不是作爲組織上的標的，它認爲凡有爲生活而生產思想的人或希望改善生活的人就是有資本主義的思想，就具有林彪的復辟思想，就是打擊的對象，而不是一切與林彪有關係的人才是打擊的對象。大陸各地有以打擊林彪死黨集團爲號召者，恐怕這也是別有作用，這是官僚派爲了避免被鬥而採取的一種姿態，企圖將鬥爭方向轉移到另一方向去。事實上，官僚派與軍人之間由於歷史關係較有默契，而文革派打擊林彪系統却並無實質的好處，因爲匪軍的組織控制得很嚴密，今天把林彪系統的某一份子打下去，接替的仍是另一系統的軍人，而不會是文革派。因此，今天文革派固然要奪權，但壓制青年、壓制人民不讓他們造起反來，還是要與官僚派、軍人派採取一致的立場。什麼時候，羣衆真的站起來運用大字報作武器，沒有人能壓制住他們，或者，文革派、官僚派，有一派敢於站在羣衆的一邊，那時的大字報就會不同了，那時大陸上也必會發生激變。

余延苗先生：

## 大字報戰爭迅速引起了武鬥 社會秩序大亂也影響了生產

的原因。

關於大字報的問題，各位先生已經發表了很多卓見，我只想在這裏提出一點補充。中共的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確曾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我們都知道，在文革初期，毛澤東想利用羣衆運動進行奪權鬥爭，却受到當權派的抵制，後來他把龔元梓的那張大字報拿去廣播，整個大陸立即就大字報滿天飛，紅衛兵運動也因此而展開，並且很快地就形成爲奪權活動的一種公式：大字報一貼，革命羣衆一轟，就把當權派抓出來批鬥，而當權派也就被打倒了。

我認爲這次「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江青集團也有這種目的意識，即還是想要運用大字報去攻擊地方當權派，奪取權力。「批林批孔」一方面固

然是在清除林彪的餘黨，另一方面也要培養江青集團的勢力。江青集團雖已掌握到匪黨中央的權力，若是地方上的黨、政、軍權力掌握不到的話，黨中央的權力最後還是要落空的。因爲地方權力是中央權力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只要毛澤東一死，則江青集團就會被瓦解。所以，掌握地方黨、政、軍權力對江青來說，這是一場生死存亡的奪權鬥爭。

在今年年初，大字報一開始張貼，就是批判領導部門的修正主義路線，這與文化大革命時的情形差不多，都是想要把當權派搞臭，搞臭之後，雖然不一定要打倒，最少也有利於江青這一派擠進領導班子，或者借這場權力鬥爭籠絡一批人。所以說大字報的主要作用，除了清除林彪系的勢力以外，還有培養江青派勢力的目的。

但是，大字報要發揮它的作用，必須能够煽動羣衆，使羣衆跟着走，否則就產生不了影響，也就沒有力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報，就曾經發揮了這種作用，這次「批林批孔」却沒有。「批林批孔」運動中大陸各地的大字報，最初並不是羣衆貼出來，只是江青派的極少數積極份子，企圖利用大字報製造羣衆輿論，結果沒有把羣衆帶動起來，也就沒有發生造成輿論的作用。後來大字報大量出現，那是毛江派和反毛江派各以大字報爲武器互相攻擊，是一場大字報戰爭，並且迅速引起武鬥，社會秩序大亂，許多地方工廠關門，影響了生產。由此可見，毛、江集團此次發動的大字報攻勢，在政治上它沒有發揮奪權工具的作用，在經濟上它却造成了很大的傷害；不但權力沒奪到手，反而帶來了害處，這也就是最近期間中共的大字報高潮慢慢地低落的原因。

王健民先生：

## 「批林批孔」實際上在放馬後砲

## 失去羣衆基礎因此搞得沒辦法

關於大字報的問題，聽了以上各位先生的意見，我想發表一點感想。大字報是毛澤東發動的。毛澤東每一次發動一個運動，在基本思想上總是爲維持自己權力或是爲奪取權力爲出發點，從前是如此，現在還是如此。

舉例來說，毛澤東在延安時，發動整風運動（整頓文風、黨風、學風，稱為整頓三風），其目的是想奪權，想從國際派的手裏把權奪過來，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從那以後毛澤東就成為真正的獨裁者，有了實際力量，那次的奪權是成功的。那時候他誘騙大家「小廣播」、「議論紛紛」，各處張貼壁報。大字報就是壁報，它不是新玩藝。我們應該還記得，在大陸淪陷前夕，大陸上的學生（如中央大學學生）在校園內設有「民主牆」，而這種「民主牆」就是壁報，也就是大字報的一種。在共產黨的政權底下，除了報紙以外，一些羣衆、共產黨的幹部他們發表意見時，就拿它來作為工具，毛澤東就把它叫做大字報，這是從來就有的，在延安時期也有，現在還繼續有，毛澤東利用它作為奪權的一種工具。

第二次運用大字報，是在文化大革命時，全大陸大字報滿天飛，經過外國記者傳播，文革消息，舉世皆知，各位記得更清楚了。毛澤東作為偽元首的地位給劉少奇搞掉了，使得毛澤東花了好幾年的工夫佈置準備，因而一下子就把劉少奇的權奪了回來，那一次毛澤東利用大字報，也搞得相當成功。

這一次「批林批孔」運動，我覺得毛澤東並不是搞得有聲有色，而是無聲無息。因為這次發動「批林批孔」是在林彪死了以後，目標已不存在，那同在延安打擊國際派、和在「文革」中打倒劉少奇不一樣，那兩次都有明顯而真實的目標，打倒目標以後毛澤東再站起來，所以都很成功。這次的「批林批孔」實際上是在放馬後砲，再加上「批林」與「批孔」實在是扯不上關係，而毛澤東却硬將它扯上關係，以至於沒人理會，老百姓、幹部以及知識份子都不感興趣，失去了羣衆的基礎，所以才搞的沒辦法，弄得無聲無色的。若是說為鞏固江青的黨、政權力，這與「批林批孔」實在沒有什麼重大關係，也將不會有很好的成就，所以現在中共只有趕緊收場了。

## 陳濟民先生：

### 「大字報」後台沒有力量

#### 故虎頭蛇尾起不了作用

毛共「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字報威力無邊，所向無敵，「文革」若干助軍隊打倒他的敵人，但他今天把林彪也打倒了，軍隊的力量已成爲他想像中的敵人。換句話說，他打擊的目標是軍隊，軍隊不成爲他自己可倚靠的力量，軍隊反成爲他的反動的力量、反對的力量，這一形勢的改變，是今天「大字報」的形勢不能與「文革」相比的主要原因。由於目前大陸上的大字報的衝擊對象是軍隊以及其有關人物，就要看什麼力量能超過或打倒軍隊。老實說，毛澤東今天沒有這種力量，不管他借重民兵也好，求助羣衆或青年團也好，甚至動員婦女也好，這些力量都是浮在表面的力量，而不是真正的力量。今天他藉用大字報的形式亦同，大字報形式的後台沒有力量，所以不管大字報衝到那裏，一旦發生問題，就會後退。今天在各地方的「大字報」不發生作用曇花一現，就是因後台沒有力量，今天的後台沒有力量，而打擊的目標又是軍隊，軍隊反擊的力量，仍然是可觀的。所以今天的「大字報」必然的現象是虎頭蛇尾，起不了作用的。

#### 杭主任結論：

最後杭主任提出十點結論如下：

(一) 大字報是毛共欺騙人民、偽裝民主的武器。

(二) 從大字報之起伏，瞭解毛共內部的矛盾與困難重重。

(三) 四大字報主要攻擊對象為毛共軍區級以上之匪軍幹部。